

知行
合一
03

日本人采用了王阳明“知行合一”这个原则，融合了西方、东方文化，才有了明治维新，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南怀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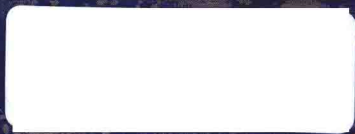
日本人与阳明学

〔日〕冈田武彦等

钱明
编译

著

日
／
本
／
人
／
与
／
阳
／
明
／
学



台海出版社

日本人与阳明学

〔日〕冈田武彦等

著

钱明

编译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人与阳明学 / (日) 冈田武彦等著; 钱明编译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168-1633-2

I. ①日… II. ①冈… ②钱… III. ①王守仁 (1472-1528) — 哲学思想 — 文集 IV. ① B248.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9644 号

日本人与阳明学

著 者 | [日] 冈田武彦等

编译者 | 钱 明

责任编辑 | 戴 晨

策划编辑 | 郭秀彦

封面设计 | 主语设计

责任印制 | 蔡 旭

出版发行 |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 010 - 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 010 - 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 - mail | thcbs@126.com

印 刷 |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 310 千字

印 张 | 24.5

版 次 |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68-1633-2

定 价 | 4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篇 阳明学的日本化

- 日本人与阳明学 冈田武彦 / 002
- 我与阳明学 冈田武彦 / 027
- 宋明新儒学与日本 冈田武彦 / 054
- 日本近世的繁荣与现代 德川恒孝 / 080
- 日本近代心学的再出发 吉田公平 / 090

第二篇 幕末日本阳明学

- 活跃于变革期（幕末维新）的日本儒者
——论楠本端山、硕水兄弟 福田殖 / 104
- 刘宗周对幕府末期思想家们的影响 疋田启佑 / 117
- 幕末维新期的日本阳明学说
——关于王阳明学说理解的方法与思考 荒木龙太郎 / 131
- 佐藤一斋与阳明学 疋田启佑 / 142
- 从山田方谷的养气学看黄宗羲思想的影响 难波征男 / 151
- 河井继之助与阳明学 牧野忠昌 / 160
- 贝原益轩对日本近现代的影响 海老田辉已 / 170

第三篇 近代日本阳明学

- 阳明学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影响 海老田辉已 / 196
- 三岛中洲的阳明学观 松川健二 / 206
- 涩泽荣一与阳明学 海老田辉已 / 220
- 安冈正笃与儒教的现代化 疋田启佑 / 239
- 楠本正继博士之宋明儒学思想研究 柴田笃 / 250
- 日本阳明学与道德共同体建设 难波征男 / 265
- 受日本近代阳明学影响的韩国的阳明学观
——以金源极的《王阳明学论》为中心 崔在穆 / 273
- 韩国近代阳明学研究的动态与日本近代阳明学的影响
——以郑寅普的《阳明学演论》为中心 崔在穆 / 281

第四篇 从阳明学到冈田学

- 冈田武彦先生的生平与学问 福田殖 / 292
- 冈田武彦先生的思想与实践 钱明 / 330
- 冈田武彦先生与日本九州学派
——以阳明学为主线 钱明 / 355
- 冈田武彦先生年谱简编 疋田启佑 / 373
- 参考文献：冈田学与九州学派研究一览 钱明 / 375
- 作者介绍 / 381
- 编译者后记 / 384

第一篇

阳明学的日本化

日本人与阳明学

冈田武彦

我认为，就日本人的精神气质来说，阳明学似乎比朱子学更能得到日本人的喜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与朱子学相比，阳明学的方法是东洋的，它适合于日本人的思维习惯，而朱子学的方法则具有较多的西洋成分。那么什么是西洋的？什么是东洋的呢？简而言之，西洋是主知的科学，而东洋是体验的哲学（这里所说的哲学与西洋所谓的哲学稍有不同）。下面我想就阳明学何以适合日本人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大致分三个问题来讲：首先，阳明学传到日本后，是经过怎样的过程而日本化的；其次，中日两国学者应怎样从比较论的立场把握日本阳明学的特质；最后，为什么说日本的民族性符合阳明学的精神。

—

朱子学传至日本，大约在镰仓时代（1185—1333），这是通过禅僧才得以实现的。到室町时代（1338—1573），对程朱等宋学的研究渐渐

深入，尽管这种研究是由禅僧担负的，但宋学实质上是超越禅学后而产生的新儒学。只是由于宋学与禅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日本的禅僧们几乎觉察不出两者之间的矛盾。后来，随着宋学研究的趋盛，才逐渐影响到文人儒士。因此，日本的儒学是离不开禅僧的，在整个室町时代和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概莫如此。一直到江户时期（1603—1867），儒学才脱离禅林而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机会，这能从当时的大儒藤原惺窝（1561—1619）、林罗山（1583—1657）、山崎闇斋（1618—1682）等人脱离禅林而成为著名的儒者这一事实中找到证据。幕府虽让惺窝和罗山撰写了《朱子学讲义》，但当时的朱子学并没有到达直接成为官学及政教之根本的程度，其登上幕府政教的高位，是在山崎闇斋时完成的。

江户时代被称为儒学鼻祖的藤原惺窝、林罗山，在介绍朱子学的同时也读了一些陆王的书。但他们标榜的是朱子学，而不信奉陆王学。在日本最先标榜阳明学的是与闇斋差不多同时的中江藤树（1608—1648）。他起初亦修习朱子学，后因读了阳明高弟王龙溪的语录，很是感慨，遂转而信奉阳明学。由于他出身近江（今属滋贺县），又德行出众，故被世人誉为“近江圣人”。当时，京都地区提倡古学的伊藤仁斋（1627—1705）之崛河派和信奉朱子学的山崎闇斋之崎门派，与推崇阳明学的中江藤树之江西派，相互争夺势力，加之其他地区出现的中村惕斋（1629—1702）、谷时中（1598—1649）、野中兼山（1615—1663）、安东省庵（1622—1701）、贝原益轩（1630—1714）、雨森芳州（1668—1755）、山鹿素行（1622—1685）等大儒，使思想界呈现出异常活跃的气氛。在藤树门下有被誉为藤门双璧的熊泽蕃山（1619—1691）和渊冈山（1616—1686）。蕃山曾仕事于备前国冈山藩（今冈山市）的池田光政（1609—1682），具有经世之才；而冈山藩则努力传播藤树学的真谛，建立了藤树教，并将其传至会津藩（今福島县西部）。藤树、蕃山的出现，使江西派

成为江户儒学中的重要一派。此后，虽再无传承，但却有研读阳明、藤树著作并私淑藤树的学者，如北岛雪山（？—1697）、三重松庵（1665—1730）、三宅石庵（1665—1730）等，接着还出现了三轮执斋（1669—1744）。在执斋之后，我国的阳明学在学问上又有了较大发展。执斋曾师事崎门巨匠佐藤直方（1650—1719），但没多久便离开直方而由程朱学转向阳明学。执斋曾对阳明著作作过标注和解释。他的最大功绩是标注出版了连当时中国也未标注的《传习录》。执斋门下有川田雄琴（1684—1760）和中根东里（1694—1765）。雄琴曾任职于大洲藩主，为阳明之教的广泛传播做过贡献。东里是经过禅学、荻生徂徕（1666—1728）的古文辞学和室鸠巢（1658—1734）的程朱学，才转向阳明学的，他所致力的是在自己的日常行动中实践阳明之教。

幕府的文教政策不同于中国和朝鲜，其对官学以外的学派比较宽容，所以在地方各藩，朱子学派以外的诸派学者也受到录用，遂使得阳明学者中有不少人参与了藩政。由于阳明学是专门提倡以心为本的学问，所以似乎显得不如朱子学对经世有作用。但既然阳明学亦属于儒教，因而它不仅讲修身，也讲治国、平天下之道，只不过认为皆为心之所发，故而主张以心之修行为重，这样一来，就使得阳明之道变得非常的简易直截。正因为此，才使阳明学具有被庶民所喜爱的特点。这点在中国也是同样的。到了明末，阳明学已普及到地方乡村，即使不识字的人，也口不离阳明所强调的良知说。这肯定与庶民生活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在日本，经过江户时期较长时间的稳定发展，从中叶开始，阳明学也受到了庶民阶层的喜爱。十八世纪以后，兴起了以心为本、以神儒佛为一体的石门心学，形成了所谓“町人哲学”。这种心学起源于中江藤树，这只要看一下藤树所撰的《翁问答》《鉴草》等著作就能清楚了。按照藤树的理论，就得承认三教一致，提倡为庶民阶级服务的通俗伦理。但当时在

上流社会里，流行着林门朱子学、崎门朱子学、古学和古文辞学，要想传播阳明心学是极为困难的。因此，阳明学可以说是通过石田梅岩（1685—1744）的心学才得以普及的。江户时代的儒者，一般都不去过问朱子学与阳明学之间的区别，而是主张日本传统思想的神道与儒教的一致性；即使在佛教问题上，也出现了儒佛一致论的倾向。石门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倡导庶民心学的，而江户时代佛教庶民化的演进也与此有密切关系。那么，当时为何会出现佛教庶民化的趋势呢？这是因为，禅宗虽是知识阶级的宗教，但净土真宗和日莲宗却在庶民中间流行；而且这还与幕府出于对基督教政策的需要而保护佛教并建立檀家制¹，使庶民不必归属宗门的政策有密切关系。

但是，阳明学派的蓬勃发展则是到幕末以后才出现的现象。这时，阳明学者无论在学术思想方面，还是在实践业绩方面，都有令人震惊的表现。究其原因，可以说与当时的时势有深刻联系，而阳明学则正好适应了当时的时势。活跃于这个时期的阳明学者是佐藤一斋（1772—1859）和大盐中斋（1793—1837）以及他们的门人学友，其中尤以一斋的门人及其学友为多。江户时代的文化，虽然在其前期就已趋于繁盛，但直到元禄、宝永时期（1688—1710）才达到灿烂成熟的程度。享保初年（1716），荻生徂徕（1666—1728）在江户设立蕺园社，倡导古文辞学。由于该派符合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时代的反体制精神以及江户人的风气，所以在享保十年前非常有声势，曾风靡整个社会。安永、天明时期（1772—1789），该派学说达到隆盛的顶峰。这期间儒学中也兴起了折中、独立、古注、考

1 日本佛教史上维系寺院与信徒关系的一种制度。始于江户时代，至今依然维持着。“檀家”是寺院经济的后援者，有时虽与檀越、檀那同义，但此处专指寺院所属的信徒家庭。寺院住持利用这一制度，组织檀家作为经营寺院传教业务的基础，1700年前后甚至伪造《宗门檀那请合之掟》，以规定檀家对寺院应尽的义务。——编译者注

证诸派，它们都力主己说，并传于门人。此外，文人、诗人们也各立门户，竞相提出新奇之说，并以独自的主张而傲然于世，终于导致徒有虚名之辈的恣肆横行，从而使儒学失去了江户前期的醇厚风格而呈现出狂妄的习气。这与明末流行的阳明学思潮有相似之处。因此，到了江户中后期，教学遭破坏，世风被污染，整个思想界混乱不堪。幕府担忧这种现象，遂于宽政二年（1790）发出禁令，将程朱学之外的学说统统视为异学而取缔之，接着又于宽政七年（1795）颁布了禁止起用异学者的文告，还把地方优秀的藩士选入幕府的学问所接受教育，让他们学成后返回各自的藩国，从而使各地的藩学再度兴盛。起初有人反对幕府的这种做法，并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正当这个时候，幕府起用了被誉为林（罗山）家中兴之主的林述斋（1768—1841），述斋则请佐藤一斋共谋政事。由于当时虽一味地执着于朱子学，但并未给人以过分拘束的感觉，况且幕府尽管一开始就以朱子学为宗，然而并不采取那种扩张门户、取缔陆王学、压抑异学的政策，而是依然保持幕府本来的立场，对陆王学采取宽容的态度。述斋死后，一斋就提出朱陆之学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观点。正因为此，使得那时的学者大都表现出表面上为朱子学而骨子里却是陆王学的思想特质。而事实上一斋也是如此，尽管他在表面上必须以朱子学为主基调，但他原本就不固执于任何学派。正是在这样的学风下，在一斋时期，原本内部互相斗争的各派，甚至朱子学与阳明学，都已渐趋一致。在一斋门下，不仅涌现出著名的朱子学者，而且涌现出著名的阳明学者，并且仕于诸藩，而活跃在幕末的动乱年代。因此，一斋遂作为一代泰斗，而受到了上下各界的尊敬。在学术思想层面上，一斋主要是对阳明学有贡献。他能兼容并蓄明代的朱子学和阳明学，并把它们融合在自己的学说中。他还十分重视体验，反对把学问仅仅局限在知识的领域内。

比一斋略晚一点，出了大阪阳明学的杰出代表大盐中斋。中斋并不排

斥程朱学，他吸取宋代张横渠的太虚说而发展了阳明的良知说。天保大饥荒之际（1830年代），中斋在大阪为救济饥民而发动骚乱，最后失败自杀。所以当时甚至有人认为阳明学是叛乱之学。但也有像京都的阳明学者春日潜庵（1812—1878）那样的寄希望于中斋阳明学的人。到了明治时代，仍然有不少人认为中斋的叛乱是正义行动；即使在前些年，企图迫使自卫队起义并在事败后自杀身亡¹的三岛由纪夫（1925—1970）等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所以社会上存在着这些人大概都具有阳明学的本领这样的想法。

到了幕末，阳明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气氛。这是因为，阳明学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很能发挥精神上的作用。所以一般来说，当时的阳明学比朱子学更充满生气。此时被视为阳明学者的，有一斋门下的吉村秋阳（1797—1866）及其弟子东泽泻（1832—1887），以及同为一斋门下的山田方谷（1805—1877）和奥宫慥斋（1811—1882），还有一斋门下的朱子学者佐久间象山（1811—1864）的弟子吉田松阴（1830—1859）等，曾私淑一斋的西乡南洲（1828—1877）也被视为阳明学者，甚至还包括朱子学者横井小楠（1809—1869）等。此外，京都的春日潜庵、但马的池田草庵（1813—1878）、四国多度津的林良斋（1807—1849）也都提倡阳明学。这些学者之间皆存在着相互交友的关系，其中良斋还是大盐中斋的门人。

幕末维新的阳明学者具有今天所没有的一些特性。第一，由于他们处在国内外的多灾多难之际，所以都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第二，他们能够兼容并蓄在明末动乱之秋深得体认之学的新朱子学（即通过阳明学衍

1 指1970年11月25日上午，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来到位于东京市谷的自卫队东部方面军司令部，绑架增田师团长，强迫其部下起义，未果，遂在主楼前剖腹自杀的事。——编者注

变而来的朱子学)和新阳明学(即通过朱子学衍变而来的阳明学),并达到了至今所未达到的思想上的深刻与透彻。第三,他们认为,人人确立起以深刻的自我体验为本的心学,是维系国家社会之纲纪的根本,唯如此,才能使国家社会开始实现真正的安宁与和平。第四,他们虽能充分摄取中国阳明学派的思想,但基本上排斥阳明后学中的现成派亚流,而倾向于归寂派和修证派等的务实的阳明学。

那么,明治维新政府诞生后日本的阳明学又有哪些变化呢?一言以蔽之,维新前后曾经活跃一时的阳明学者几乎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阳明学也出现了衰退的倾向。明治政府为了迅速摆脱相对于欧美列强的落后地位,迫不及待地想推行全盘输入欧美文明文化的革新政策,结果使得国内体制,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而且在教育思想文化上,都出现了新旧因素的矛盾,引起了欧化主义者与国粹主义者之间的激烈冲突。因此,当时的思想界混乱不堪,甚至连究竟什么是日本人应该走的进步之道也没有搞清楚。为此,明治二十三年(1890)颁发了《教育敕语》,就此道做了明确宣示。然而,对西洋物质文明一边倒的现象仍普遍存在。而日本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步入近代化的,其结果,就是导致了东洋思想不能不日趋衰竭的现实。如果从传统的东洋思想的立场审视问题,则欧美思想是功利的,具有使人心趋向轻佻浮薄的弊害。这种倾向在明治二十八年(1895)日清战争中日方取得胜利后变得更加强烈。而目睹了这一情势的阳明学者以及信奉阳明学的人,其忧国之情遂油然而生。那时,经历过幕末维新的大儒们,或者感叹世道的衰退而愤然离开人世;或者固守古人之教而隐居山林、独行其道。但不久他们就再也不忍眼看着时势恶化下去了,于是便举起阳明学的旗帜,欲以救正时弊。尽管当时信奉朱子学的人,还有信奉佛教或国学神道的人,也忧虑时弊,也为此发行了各种启蒙著作和杂志,并对当时的知识阶层和庶民阶层的心灵有所触动,但最活跃、最有生气地

掀起各种运动的，却是当时的阳明学者及其信奉者。此时的阳明学者，首先运用西洋的研究方法钻研学问，并努力判明事物的本质，但同时又基于东洋思想史的立场，对西洋与东洋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比较，以全力阐明阳明学具有与西洋哲学同等的世界权威性的道理。其次他们认为，阳明学的特色在于心的修养和实践，这正好适合日本的民族性，因而只有立足于阳明学，才能根除时弊，维护国体，使日本威震海外。

随后，时世也从明治到了大正，又从大正到了昭和，而这种思潮也在发生着变化。从昭和初年（1926）到二十年，虽能看到文明开化的风潮已有所减退，但就主流而言，明治以后的这股风潮似乎依然我行我素。一般来说，对这一风潮的弊病最有切肤之痛的是阳明学者及其信奉者。从明治二十九年到大正末年（1896—1926），刊行了以阳明学为主题的专门杂志，其中之内容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明治二十九年，铁华书院发刊了《阳明学》，接着明善学社又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发刊了《王学杂志》，并作为其续刊，于明治四十一年至大正三年（1908—1914）发刊了《阳明学》。铁华书院的刊物与明善学社的刊物在主要内容上有所区别。上述杂志均发行于东京。从大正六年（1917）开始，大阪也刊行了《阳明》杂志，接着又在大正八年（1919）发刊了《阳明主义》。这些杂志，无不对阳明学的思想及其资料作了论述和解读。不仅如此，它们还对朱子学、佛教以及一般儒教也进行了论述。在所刊行的各期杂志中，不仅有阳明学者的传记逸话，而且还有其他名士的情况介绍，甚至还进行时事评论。总之，当时的读者能很好地从中体会到阳明学的精神，并将其运用于实践，从而求得对现实社会的净化。对于《阳明学》杂志发行的动机，在各个发刊辞中都已做了说明，现将明治二十九年七月五日最早刊行的《阳明学》卷首所登载的“发刊辞”的梗概摘录于下：

个人有本然之任务，犹如国家有自然之任务。此任务至高至大，在个人为自主，在国家为独立。而经纶天下之大经，赞成天地之化育，裨补世界之文明，则未曾当其本领必不可矣。苟个人尽此任务，则其人为圣人、为大人、为至人；苟国家尽此任务，则其国为强国、为雄国、为大国矣。然则此任务即在尽其道矣。

道者，天地自然之道也，人事至善之道也。斯道也，自灵妙，自圆满，自正大，自光明，自又活泼泼地。道虽无大小、无精粗，无厚薄，然千种万样，决非能成一也。

只有看透此东邦伦理之大道，并照之以吾国固有之风土士道，质之于宇内共有之大原理，而敢不悖者，如若发明儒家之大道，唯此阳明学乎！阳明一生工夫，不外“致良知”三字，而至精、至神、至明、至妙、尽心、尽性、尽道之极致，无复余蕴矣。彼非以空言自高，而以知行合一、自得所有也。

盖一人之精神，千万人之精神也。竭个人之任务，则竭国家之任务也。一人之精神刚毅，一国之士气安能不发强活泼耶？而个人之涵泳修养，在以知行合一为主；知行合一之教，则有待以阳明学为主也。阳明学者，陶冶今日之人心、革新一代之风气之一大兴奋剂也。

今之吾国，作为东邦新兴之一大雄国，必竭其任务，立其位置矣。然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繁荣，而一国之风气日渐卑下；随着文化生活的日益进步，而一国之风俗日渐浮薄；随着社会机构的日益完善，而一国之士气日渐萎靡。此乃无伟人杰士之起，而以世道人心风靡者也。是岂非为社会风教发一大猛省之时耶？今日研究吾人之阳明学，虽不外为心学修养、人才陶成，但若能使天下之人皆知个人本然之任务，延以革新一代之风气，而裨补于

国家，则洵吾人发刊之本怀也。

当时的阳明学者及其信奉者之所以要极力推崇阳明学，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阳明学所提倡的精神修养之道和力量精神之锻炼，及其所强调的活学之必要性，对于纠正欧化主义的恶弊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他们说：

欧化主义、沙文主义，一度浸染我国也，遂使世人滔滔，驰心于细智曲慧，而置精神敬养之道于度外；高谈文明，而不思其处世之道、竭国之义。是于政治家，有负其道义之责者；于代议士，有忘其道德之操守者；于将校，有丢其军人之品格者；于学者，有自得于曲学阿世者；于文人，有为书林之奴者；于新闻记者，有不知廉耻者；于宗教家，有成道德之罪人者；于司法官员，有污于贿赂者。若来一一详述，殆不胜俚指也。呜呼！我帝国以威武成东邦之雄国矣！要想成为世界之强国，若从道义上做，则成不了世界第一等国也！否否！在于其精神的、道义的，若腐败萎靡，则其威名武勋亦不能永保之矣！此必然之理势也！

成于精神修养哉！若举精神修养之实乎，则政治家、代议士便会有善任国家之重的志向，将校便会显示出善为勇士的面目，学者文人就会肩负起不羁卓立之气象，宗教家便会激发出殉道之志，青年书生便会鼓舞起强毅力行之精神，于是社会之元气、国家之士气，自然能复活矣。而精神之修养，唯在于人人实行涵泳体察之工夫矣。（《阳明学》第1卷第2号《精神之修养》）

又指出：

盖成力量精神者，固无形之物也。随其寓所之形器，而虽非无大小，然至灵至活，充塞浩然天地而通物我。当其一旦猛然而发，沛然而动也，天下之能制其物者无矣。伯继（熊泽蕃山）于阳明学，承之于中江藤树，于其力量精神，犹如增伟大之感化；东湖（藤田东湖，1806—1855）学于其父幽谷（1774—1826），幽谷所得有伯继之学，遂将之传于东湖，其力量精神之涵养渊源有自矣。象山（佐久间象山）亦基于阳明学，其力量精神之锻炼寻常自如矣。凡为大人俊杰一代之师者，知其行事皆非偶然矣。离活世界之活事物，而穷古人之空文空字者，不足取也。力量精神，所以动事物之原素矣。正己者，亦能治人，亦能担当一国，亦能担当天下，此莫非力量精神之作用矣。天下活机，人亦活物，而社会之所以成立，国家之所存立，亦皆莫由于活机矣。此据于活事活物之间，薄志弱行，力量精神无所自立，则如浮浮泛泛水上之萍，所欲而无所达，所为而无所成。是即见其力量精神之大小如何矣。而其人之所为如何，其事业之大小如何，亦足以判其力量精神之大小所以如何也。而成力量精神者，亦自要千锻万炼之大工夫矣。

今外形文物之大进，生产事业之大进，然人皆偏于器械之作用，徒汲于行乐主义，而不复知有他；如此一来，遂使精神的日本人日减矣。是何以故？不务于人之力量精神之锻炼所致矣！士之所当为者，奈何之致力于力量精神之锻炼，而必自立矣！（《阳明学》第1卷第4号《力量精神》）

那么，明治三十年（1897）究竟是怎样的时世呢？当时有些倡导阳明学的人，把这一时期比作是道义被废除的中国宋末和西罗马时代，或者